

作为现代中国历史起点的五四运动

道路与选择

张德旺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道路与选择

张德旺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路与选择 / 张德旺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455-4762-7

I. ①道… II. ①张…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 IV.
①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57619号

DAOLU YU XUANZE

道路与选择

出品人 杨 政
作 者 张德旺
责任编辑 余守斌 曹志杰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内文排版 麦莫瑞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 100078)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电子邮箱 tianditg@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20千字
定 价 6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4762-7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营销中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引言：划时代的转折点 /1

- 一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
- 二 五四运动研究的总体思路和叙事体系 /8
- 三 五四运动的目标 /33

酝酿

第一章 世界格局巨变 /39

- 一 日本霸占山东 /39
- 二 朝鲜爆发三一运动 /43
- 三 美国的双重影响 /51
- 四 十月革命的胜利 /56

第二章 中国面临转折 /61

- 一 “黄金时代”短暂 /61
- 二 政治重心真空 /65
- 三 社会能量在集结 /68
- 四 学生在行动 /75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81

- 一 《新青年》创刊 /81
- 二 蔡元培北大改革 /90
- 三 开启文学革命 /99
- 四 新闻改革肇始 /103
- 五 学生社团潮动 /107
- 六 与封建顽固派对垒 /119

爆 发

第四章 五四运动爆发 /127

- 一 巴黎和会无视中国 /127
- 二 国内群情激愤 /137
- 三 五四这一天 /142
- 四 营救被捕学生 /149
- 五 蔡元培辞职离校 /152
- 六 北京总罢课 /154

第五章 各地和海外响应北京 /160

- 一 天津：京外枢纽促联合 /160
- 二 山东：动员早，众志坚 /163
- 三 湖北：武汉学子洒热血 /167
- 四 广东：学商工齐奋起 /170
- 五 江苏：多地城乡联动 /173
- 六 浙江：学联带动“三罢” /176

- 七 安徽：学生引领各界 /178
- 八 江西：讲究策略实效 /181
- 九 福建：两市带动全省 /184
- 十 山西：各界配合学生 /186
- 十一 河南：女生率先反抗 /187
- 十二 湖南：抗高压，《评论》响 /189
- 十三 四川：坚韧抵制日货 /192
- 十四 陕西：学子并肩抗争 /194
- 十五 云南：各方同仇敌忾 /196
- 十六 贵州：官民共同对敌 /198
- 十七 黑龙江：工运鼎力支持 /200
- 十八 吉林：各族捍卫主权 /202
- 十九 辽宁：学生勇破禁锢 /203
- 二十 广西：波澜从东向西 /205
- 二十一 内蒙：少年斗志顽强 /206
- 二十二 其他各地：紧密联系，共同发声 /207
- 二十三 海外：赤子忧国奋起 /209

第六章 六三运动和六五运动 /214

- 一 破坏与镇压愈演愈烈 /215
- 二 六三运动——北京学生大无畏抗争 /216
- 三 六五运动——上海“三罢”支持北京 /222
- 四 上海各界持续斗争 /228
- 五 六三运动和六五运动的鲜明特点 /236

第七章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 /244

- 一 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的方针 /244
- 二 陈独秀、胡适等人冲到前台 /245

三 爱国团体的联合和发展 /255

四 国内外协力抗争 /259

五 中国使团毅然拒签 /263

第八章 捍卫并发展五四运动成果 /272

一 持续反对日本扩大侵略 /273

二 决绝对抗军阀专制暴政 /285

选 择

第九章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305

一 新闻界全面改革 /305

二 文学革命高歌猛进 /308

三 “整理国故”运动发端 /313

四 教育改革多方展开 /319

第十章 西方学说思潮大力引进 /324

一 实用主义全国滥觞 /324

二 罗素临别明确回应 /331

三 无政府主义思潮蔓延 /338

四 人本主义不断渗入 /347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355

一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系统传播 /355

二 国民党人积极传播 /367

三 研究系热情介绍 /371

四 多方参与传播 /374

第十二章 文化保守主义纠偏 /379

一 杜亚泉东方文化派 /379

二 章士钊新旧文化调和论 /384

三 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 /387

四 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390

五 张君勱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396

六 学衡派攻击《新青年》 /401

七 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 /405

第十三章 社会改造的思想论战 /409

一 指针之争——问题与主义论战 /410

二 道路之争——社会主义论战 /418

三 主体之争——无政府主义论战 /423

第十四章 改造社会的实践探索 /430

一 工读互助团昙花一现 /430

二 妇女解放发轫 /434

三 非基督教运动开始 /438

四 北京“驱彭挽蔡” /440

五 湖南“联省自治” /443

六 旅法勤工俭学起波澜 /446

七 现代工人运动起步 /455

第十五章 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462

一 《新青年》编辑部分裂 /462

- 二 “少年中国”分途 /467
- 三 从《觉悟》右转到北大新派教师分裂 /472
- 四 新文化统一战线解体 /477

回 望

结语：总论五四运动 /483

- 一 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483
- 二 五四运动的中心 /488
- 三 五四运动的原因与对象 /493
- 四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和主导思想 /496

五四运动大事年表 /503

参考文献 /516

后 记 /525

引言：划时代的转折点

——从五四运动的意义、总体研究思路叙事体系和目标说起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提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起点”，有三方面考虑。

一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这是我们提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起点”主要原因。对此，已有诸多政治家、学者论述；这里，笔者强调三点。

其一，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历史进程角度看，五四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醒和革命精神，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左宗棠新疆平叛抗俄，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一不再惜鲜血生命粉碎了西方列强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但又一再表现出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的弱点和缺失，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对帝国主义的软弱退让和义和团运动对西方事物的盲目排斥。五四运动则不同，中国人民通过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开始认清西方列强同属一个“强盗世界”，从而开始彻底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把反对日本侵华势力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来自世界人民包括列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同情和支持结合起来。

同时，中国人民认清了北洋军阀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高压专制的反动本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不断进行的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一再表现出对封建统治集团的残暴和狡诈认识不足的缺点。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向袁世凯求救，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旗号，孙中山让出大总统职位，原因当然有诸多方面，但其共同点之一是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前述两面性认识不清。五四运动则不同，明确地把斗争矛头集中于一小撮亲日派军阀政客，同时明确指出，虽然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被罢免，但台上执政当权者与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应对他们抱任何幻想。

正是基于以上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本质认识的新觉醒，中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迅速形成了中国社会必须“根本改造”的共识，并进一步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集中的关于“中国社会如何根本改造”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才找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新方向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思想武器，中国革命才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其二，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高度看，五四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文化的自省意识和放手学习借鉴外国主要是西方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勇气，开创了中国空前的以民主、科学为显著特征的精神文化现代化繁荣活跃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时代。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之下，充分肯定了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特别是军事文化的必要性，并实际取得了有限的但影响深远的初步发展。维新派和革命派把现代化追求重点放在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结束封建帝制等更为突出的历史性成就。但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共同的缺点和失误是没有认清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忽视或轻视了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并不反对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而是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把握住了“说服大多数人

民”^[1]这个历史主题，深刻总结了已往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精神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鲁迅强调“根柢在人”^[3]，都明确表达了这种觉醒。

为此，新文化先驱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对世界现代化全局整体把握的历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对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精神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历史反思，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下，对传统精神文化禁锢人的思想、摧残人的个性等种种弊端进行了痛切审视、深入清算；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自由研究的对象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构建中国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废弃“国渣”，^[4]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有了这种自省精神，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大潮中屡屡丧失发展机遇，落后挨打的关键内因，才可能真正发愤图强，后来居上。

据此，笔者认为当年和现今一些政治家、学者指出五四运动“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5]“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6]等缺点是必要而正确的，而且应该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适提出，五四运动“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7]，是“一

[1] 列宁把十月革命前“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与克伦斯基、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称为“说服大多数人民”的任务“占着首要地位”的时期；把“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称为“夺取政权并且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的时期；把1918年2月以后称为“组织对俄国的管理”时期。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496页。与此比较，笔者认为，五四时期，中国正处于需要新一代革命先驱用新学说、新理论“说服大多数人”时期，而非“夺取政权”或“组织”“管理”中国时期。

[2]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第6号。

[3] 《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4]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9页。

[5]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6]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8页。

[7] 《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6页。

场不幸的干扰”，“把一个文化运动，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李泽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标志“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是“救亡压倒启蒙”。^[2]笔者认为与历史实际不符。历史实际是，五四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无数的白话传单把白话直接传播到全国各界民众当中就是典型例证。应强调指出，在近代中国绝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政治运动、革命斗争与新文化运动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两者的密切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出特点和突出优点。李大钊与邓中夏、黄日葵等6位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联名提交学会1922年杭州年会的《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中指出：“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而奋斗，在群众结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成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3]就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提出“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4]的口号，到井冈山红军“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5]就是中国革命与思想启蒙结合前进的缩影。

新文化先驱们利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不能形成强势政治中心、无力制造文化禁锢钳制局面，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契机，推进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的对

[1]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2]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87页。

[3]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64—265页。

[4]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5]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西方文化全面大规模开放和学习，使中西古今文化实现了近代以来空前广泛深入的自由碰撞交流，更使对外开放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长远发展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把“输入学理”作为再造中国现代新文明的重要前提、基本环节，深刻地代表了中国人民这种开放意识的理念升华。

从而，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把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民主精神、科学态度全面引入中国，使中国精神文化现代化出现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千说竞起、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条件，先进知识分子才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化各类学科专业，才造就了以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才使中国现代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才有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全面推进的新时代；特别是，才涌现出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群体，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成果，中国才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而辉煌的探索。

其三，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视角考察，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发生了结构性的根本变化，开始了主导力量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才开始努力掌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权。

首先，工人阶级以政治大罢工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and 影响，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高潮期间，由于中国工人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没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政治力量，提出本阶级的政治纲领、政治口号；但却明显表现出不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束缚的新趋向。上海工人罢工就坚决拒绝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民国日报》等报刊和穆藕初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中国民族资本工厂、英美“友邦”工厂工人不能罢工的呼吁，也拒绝了一些学生要求不要罢工的劝说而毅然行动。于是才有上海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广大店员等共计18万人大罢工，给中外反动势力空前猛烈的震动；罢工中又明显表现出工人大公

无私、为国牺牲的政治特质。研究系《时事新报》十分敏感，明确指出：“我们这番罢工和近来的外国的罢工性质完全不同”，“是表示我们不愿受二三卖国贼的支配，为争回民主国民的资格”。^[1]这表明，五四运动高潮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以政治大罢工的实际行动，呈现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迅速转折的雄伟英姿。

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表现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巨大鼓舞。胡适在中国拒签和约后说：“现在中国专使居然不签字了。将来一定有人说这是‘电报政策’的功效。其实不然。这一次七千个电报所以能收效，全靠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和‘六五运动’。要不然，那七千个电报都只是废纸堆里的材料。”^[2]所以，五四运动高潮后，全国知识界掀起了宣传劳工的热潮，特别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彭湃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迅速走上与工人阶级、农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开始在工人、农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使农民大众迅速向中国革命主力军转化。

其次，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漫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即士、士大夫）被科举制度机制和“学而优则仕”等观念所束缚，作为一个阶层，总体上只能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依附阶层。以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为标志，这个态势开始发生了根本转变；到五四运动前夕，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个以生产、传播文化产品为经济立足点和影响社会手段的社会阶层。其中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们，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所向披靡，成为全国传播新文化的中心；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又是他们瞩目中外，评议时政，实际成为全国反帝反封建爱国政治运动的思想指导中心。

还应指出，这个主体核心从一开始就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以陈独秀、李

[1] 《时事新报》1919年6月11日。

[2] 胡适：《七千个电报》，《每周评论》1919年7月6日。

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者们，包括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学衡派诸君等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非主流派代表人物，都在坚持对外开放、放手吸收外国西方先进文化时，保持了高度的主体意识，即绝非全盘照收，而是从中国社会改造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从救亡图强的迫切需要出发，努力把西方先进学说与中国实际需要相结合，并坚持这一思想方向。这种主体意识的背后则是深深积淀在五四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骨髓之中的中国源远流长的士大夫“经世济用”优良传统。

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认为它应“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也都实际含有任何外国理论学说都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内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由这样的思想幼苗起步，培养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参天大树，从而标志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努力掌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是他们，从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起，就很快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自觉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工农劳动大众中去^[2]，使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从此不断胜利发展，并积极为人类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无论就对内、对外而言，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近代中国由不断丧失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而向着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经济富强、社会文明的向上上升趋向的转折点。^[3]

[1]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7日。

[2] 如邓中夏指出：“中国‘现代式的’工会，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市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触”。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14—15页。

[3] 参见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二 五四运动研究的总体思路和叙事体系

因为这些总体思路和叙事体系集中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的各政派、学派及学者个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过程及其认识成果，是我们提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起点”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基础。百年来五四运动史研究大体有三种总体思路和叙事体系。

第一种是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肯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密切联系的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

最早这样阐释的是李大钊。他说，“五四运动是因外交问题激起的”^[1]，是“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2]，“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它不仅“为爱国运动”，而且“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3]五四运动还“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之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清明，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4]“‘双十’与‘五四’”“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5]

李大钊的论断内涵丰富：其一，明确指出了五四运动具有反对外国强权侵略的民族革命和反对腐朽军阀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其二，明确指出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两大历史潮流的一部分；其三，充分肯定了学生投身并发动各界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腐朽政治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其四，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是与辛亥革命一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样，李大钊就初步为重视十月革命影响、肯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密切的总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

[1] 李大钊：《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说词》，《学生杂志》第9卷第11期。

[2] 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晨报》1921年5月4日。

[3] 李大钊：《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国民》第2卷第1号。

[4] 李大钊：《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纪念“五四”大会上的演讲》，《晨报》1923年5月5日。

[5] 李大钊：《双十与五四》，《新生活》第10期。